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本）

广西壮族 社会历史调查 (五)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民族出版社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本)

广西壮族 社会历史调查

(五)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 5/《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
—修订本.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5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ISBN 978 - 7 - 105 - 08778 - 5

I. 广… II. 中… III. 壮族—民族历史—社会调查—广西 IV. K281.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59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mzchs.com>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75 字数: 402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4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8778 - 5/K · 1628 (汉 79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010 -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总修订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德洙(朝鲜族)

副主任：吴仕民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春(回族)

石玉刚(苗族)

刘明哲(黎族)

贡保甲(藏族)

李明金(苗族)

杨志杰(回族)

张宝岩

陈乐齐(侗族)

罗黎明(壮族)

钟小毛(畲族)

舒展(满族)

谭建祥(土家族)

陈改户

马玉芬(回族)

曲伟

刘宝明(彝族)

李文亮

杨丰陌(满族)

肖晓军

阿迪雅(蒙古族)

武翠英

赵学义(满族)

禹宾熙(朝鲜族)

谢玉杰

铁木尔(蒙古族)

王德靖(土家族)

刘志勇

孙宏开

李秀英(瑶族)

杨圣敏(回族)

张忠孝(回族)

陈理(土家族)

罗布江村(藏族)

胡祥华(土家族)

贺忠德(锡伯族)

雷振扬

办公室主任：陈乐齐(兼)

副主任：朴永日(朝鲜族)

成 员：李锡娟

丁 蕾

孙国明(蒙古族)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修订编辑委员会

主任：杨圣敏(回族)

副主任：王建民

成员：(姓氏笔画排序)

丁宏(回族)

王建民

方铁

李晓斌(白族)

吴福环

张跃

潘守永

潘守永

马戎(回族)

王希隆

白振声(满族)

许宪隆(回族)

苏发祥(藏族)

揣振宇

马建钊(回族)

王文长

李绍明(土家族)

曲庆彪

杨圣敏(回族)

黄有福(朝鲜族)

办公室：潘守永(兼)

徐姗姗(回族)

黄镇邦(布依族)

王剑利

陈雨蕉

莫晓波(瑶族)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修订再版总序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 21 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 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 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 1958 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 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 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 402 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 1958 年启动至 1991 年基本完成，历时 30 多年，涉及全国 19 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 400 多个编写组，1760 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 30 多家出版社出版。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横看世界，像这样由政府组织为国内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盛世修史、修志，这是中国的传统。由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出版时间长，涉及地区广，出版单位分散以及受当时环境条件局限，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体例版本不统一；二是有些解释不准确；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为适应民族工作发展和民族问题研究的需要，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国家民委决定从2005年开始对《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行修订再版。

这次修订再版的总体原则是“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本，增加新内容”，统一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

《中国少数民族》的修订，旨在原版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结构，更新有关数据和资料，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增加各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发展成就。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修订，本着“适当修订、适量续修”的原则，对有明显错误的内容、观点、表述进行更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史实予以补充。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修订，力求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社会的基本情况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成就和经验，新编1987年以后成立的16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概况。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修订，旨在改错，增补新的研究成果，增写《满族语言简志》，并合订为6卷本。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修订，主要是尊重史实，修正错误，增加注释。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修订再版工作，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各有关地方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央党校、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民研所、云南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哈尔滨学院、吉林民研所、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博物馆、广西民研所、甘肃省委党校、凉山大学、中国教育部语工委、云南语工委等单位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的专家学者以及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共1000余人积极参与了修订工作，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修订再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将以更全面、更完整、更科学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李德洙

2007年8月

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本《丛刊》的资料搜集和编辑整理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地区和单位集体进行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开展民族工作，就曾组织民族研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过调查。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秉承党中央指示，进一步组织了若干调查组，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过程中，又做了必要的调查。现将历次调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由各有关单位分别加以整理，编辑出版，这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材料，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不准确和不全面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

修订再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世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等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有84种145本。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为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本次修订再版，在尊重史实，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式的总原则下，主要是订正错误，并以修订注释的形式增补新的人口数据和地方行政隶属的变化情况。另外，原书中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因无资料可查核，部分只能保持原貌，仅供参考。《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牧区社会历史调查》不再单独出版。新增《吉林省朝鲜族社会历史调查》、《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海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4本。修订本合计为86种147本。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修订再版工作，得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的重视和关心，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广东民族研究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对关心、支持修订再版工作的各级领导、有关部门、专家学者以及所有热心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2007年12月

目 录

宜山县洛东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	(1)
一、概 况	(1)
二、历 史	(3)
三、经 济	(8)
四、政 治	(50)
五、文教卫生	(54)
六、宗教信仰与节日	(62)
七、生活习俗	(65)
田东县檀乐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	(76)
一、概 况	(76)
二、经 济	(78)
三、政 治	(87)
四、文教卫生	(110)
五、生活习俗	(118)
东兰县那烈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	(127)
一、概 况	(127)
二、经 济	(129)
三、政 治	(140)
四、文教卫生	(153)
五、生活习俗	(156)
后 记	(167)
东兰县中和区东里屯社会历史调查	(168)
一、概 况	(168)
二、政 治	(170)
三、经 济	(177)
四、文教卫生	(186)
后 记	(224)
后 记	(225)
修订后记	(226)

宜山县^①洛东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

调查整理者：韦文宣 王天奖 谈 琪 唐兆民
张介文 颜世杰 吴 琼
稍加整理者：唐兆民 李维信

一、概 况

洛东乡^②于1958年撤区并乡时建立。全乡境域包括原来的洛东、大曹、寻田三个小乡。并乡不久，于同年8月25日建立了洛东人民公社。全乡共有37个自然村，6个生产大队；大队办公室地点分别设于大冲、坡榄、王格、大曹、塘冲和寻田等村。除大曹、塘冲、木见、大成4个村约有300户是汉族外，其余都是壮族聚族而居的村庄。据1958年8月统计，全乡共2163户，10 039人。其中从事工商业的20户，65人；从事农业的2143户，9974人，其中男性4846人，女性5128人；主要劳动力2674人，附带劳动力1510人。

耕地土质以壤土、黏土为数最多，而且绝大多数都在平坝上。全乡耕地共27 842亩，其中水田16 471亩，旱田1463亩，畲地9908亩。平均每人占耕地2.7亩有余。

乡内壮族居民以韦、覃两姓为最多，其余则为彭、梁、廖、兰、莫、谢、何、黄、樊、钟、罗、周、张、姚等姓。汉族有周、程、张、黄、罗、韩等姓，而大成村韩姓原为韦姓，约30年前才改韩姓。这些汉族聚居的村庄都集中在乡境北部，即唐代的曹洛县治所在地大曹村附近。

壮族自称为“布宗”（pú zìng）；称汉族为“布滚”（pú guǎn），“滚”即“官”的对音，意即讲官话的人；称苗族为“温苗”（wēn miù）；称瑶族为“温友”（wēn yóu）；称侬佬族为“布整”（pú kǐm）。

洛东乡在宜山东南约40里，东界三岔乡，西连洛西乡，南邻平南乡，北接柳城县六塘乡。环乡四周皆山，中间是一片肥沃的小盆地，东西约20里，南北约15里，地面开豁。

乡境边缘尽是石山，具有喀斯特（岩溶）地形的特点，到处奇峰兀立。乡内的山都各有名称，其中最著名的，照当地俗传“东有‘挂榜’（在三岔口），西有‘灯台’（在洛东圩后），南有‘大坡’（在坡榄村后），北有‘群羊’（在大曹村后）”。石壁间常有深邃的岩

① 1993年9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宜山县，设立宜州市。修订注。

② 今辖洛东社区及坡榄、板乐、寻田、大曹、王格五个村委会。修订注。

洞，地下也往往如此。因此，穿山过洞的溪水以及从伏流中涌出的源泉，所在多有。当地壮族对这种由地下涌出的流水，大者称潏（lèn），小者为泵（mèn）。泵本作“蹦”（bèng），此处借为壮族村名，洛东地区壮族读作“闷”（mèn），泉水之意。如潏村和泵村，均因此种涌泉而得名。

乡境内的大河为龙江，自西而东，沿着北境奔流，经三岔乡而入柳江县境。此水可通木船，有航运之便；但因河床过低，而少灌溉之利。可供灌溉稻田的，反而是由山洞中流出的三条溪流。一条发源于宜山县南部的水头山，北流经那养村，入洛西乡境，折而东流，经王客村而至大曹村附近，汇合发源于潏村的溪水，注入龙江；一条发源于平南乡的板罗村背之大潏，东北流约3里，折而北流，经朋友村后的山隘而入乡境，复经冲翻、板亮等村，至坡榄村南，支分为二：左支流经坡榄村西，至花流村前，北流经方田、田心等村，注入龙江；右支流经坡榄村东，出喇坡村前，又分一小支，北流灌溉上摩、思九等村稻田，主流则东北奔流，经大安至山脚村，纳山脚的泉水，至洛东车站附近，流经覃田村而注入龙江。一条发源于潏村之大潏，向东北流经泵村，纳泵村之泉水，再东北流经吴村，至大曹附近，汇合洛西流来之溪，注入龙江。这三条溪水，虽然宽不过一丈，深不过3尺，但全乡1.6万多亩稻田完全仰赖它来灌溉。其中由洛西流经塘冲、大曹等村的一条，源较远而流量较大，经冬仍能保持可资农田灌溉的水量。发源于潏村泵村一条也经冬不涸，故有“龙死不旱”之谚。只有发源于板罗村的一条到了冬天溪水就消减大半，如果遇春旱，则坡榄、花流、喇坡、思九、大安等村附近稻田便因缺水灌溉而不能进行春耕。此外，溪底多是石灰岩，罅隙甚多，若不勤加补塞，水从罅隙中漏去，也会影响灌溉。

乡境当桂黔的交通要冲，黔桂铁路由西而东横贯境内。铁路尚未建成之前，由广西柳州通往贵州独山的古道，大致也是沿着这条铁路线的。如以乡政府所在地（旧圩）为中心，东行200里至柳州，20里至三岔，10里至洛黄，与柳江县的流山、洛满、成团（旧名二都）接界。西行约20里至洛西，再20里而达宜山县城。西北行有大路可通柳城，20里至六塘，再90里至柳城县城。这条交通线是较早的古道，在明末以前，桂黔交通要道是由柳州经柳城，再经六塘，而抵大曹，复西行经庆远府城而通贵州的。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岳和声来庆远府做知府时，便是沿着这条古道走的，有他所著《后骖鸾录》可证。南行约6里，到冲翻村，越喇隘山坳即为平南乡境，有路可通南乡圩和祆峒（现名欧峒）。这一带即为清代理苗县丞的辖境。此外，境内村屯之间都有大小路径互相联系。解放后，于洛东圩修筑了一条公路通往黔桂路的洛东火车站附近，如果把桥梁涵洞再加修筑，即可通车。现在全乡6个生产大队都已安装电话，彼此联络，甚为方便。

洛东圩是乡境内唯一的圩市，有33户，人口不过百余。街道狭窄，解放前只有一两间小杂货店，每逢圩期，赶集的人最多只有500人左右。但在本乡的近邻却有几个较大的圩市，西面有洛西圩，东面有三岔街，东北面有六塘圩（属柳城），南面有南乡圩，均与洛东圩相距约20~30里。

乡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在20℃左右，最高37℃，最低零下2℃~零下3℃，夏季长达6~7个月（即5~10月）。冬季约两个月（即12~2月），霜雪很少见到。年平均降雨量为1284毫米，大部分集中于5~8月，约占年总降雨量的70%；2~4月次之，约占年总降雨量的20%；1月及9~12月雨量最少，仅占年总降雨量的9%。年日照时间在1560小时以上。一年四季作物都能生长，对于农业生产是十分有利的。

境内地面平坦，土地肥沃，物产资源相当丰富。粮食作物有稻谷、玉米、大麦、小麦、

黄豆、荞麦及红薯、芋头等，经济作物有甘蔗、芝麻、花生、油菜、蓝靛、烟草等，矿产则有铜、铁、煤、硫磺、石英石等。

全乡现有农业中学一所，是1958年开办的，学生共56人；初级小学7所，完全小学一所；卫生院一所，卫生所6所（每个生产大队各一所）；中心俱乐部一个。每个大队都有供销部和信用部。此外，宜山县第三中学校址也在乡境之内，开办至今已历3年。当地农民子弟上学极为方便。

全乡每个生产大队，都已建立了党团支部。全乡共有党员78人，团员200多人。

二、历史

（一）历史概述

宜山县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域，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据地方志记载，远在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南越王国”之后，设置的郁林郡属的定周县，即今之宜山县地。当时曾筑有土城。至唐朝天宝元年（742），宜州刺史吴怀忠修筑宜州城，即因汉代土城而易以砖石（见1918年纂修《宜山县志》卷一）。其说虽未可尽信，但在唐代以前，这个地方已为封建王朝所管辖，似乎不应怀疑。因为宜山县地处广西中心地区柳州的西边，两地相距不过260里。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柳州这个中心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力图把势力伸展到西边的宜山地区，这是极其自然的事。由于这里是一个山重水复、易守难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自汉以后，历三国、两晋、南朝以至于隋，封建王朝在宜山地区的统治势力仍很薄弱，故在汉文史籍和方志中都没有这个地区的有关记载。

到了唐代，有关宜山地区的军事和政治的记载，已经比较详明。这个时期，唐王朝在这里的统治势力已大大加强。据汉文史籍记载，现在的宜山县境隶属宜州，是唐代的龙水、崖山、东玺、洛封（后改洛曹）等县的境域，而且还包括环绕着这些县境的三个羁縻州——即温泉州、琳州和蕃州。这三个羁縻州之下，又各领2~3个县，共8个县。唐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由此深入到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并分割其地设州置县，分而治之。这个事实反映唐王朝统治势力的加强，同时也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封建王朝利用少数民族的上层来进行统治，实行“羁縻”政策。

到了五代时期，宜州先后属于楚马氏和南汉刘氏。当时封建王朝对这里的统治势力，较唐代又有了加强，其表现是把崖山、东玺并入龙水县，使纵横约50里的龙水县辖区扩大，权力加强了，地位也日益重要。

宋代，封建王朝把原属柳州的洛曹县也并入了龙水县（后改宜山县），归宜州管辖。原有的羁縻州，也从此次第归并。到了明朝，已经不再有温泉、琳、蕃等羁縻州的名称。明封建王朝为了实现“分而治之”和“以土治土”的统治政策，便把宜山县内一些少数民族反抗斗争较激烈的地区分割开来，设置永定、永顺正副三个长官司。清代封建王朝则继承了明朝统治者的老办法，这些土司辖境并没有多大改变。至雍正年间，在县境东南部划出了功德、窑灰、清潭、南乡四里。建立理苗分县，由宜山县丞管辖。

必须注意的是，宜山县城自唐初至清末，一直附在宜州州城或庆远府府城之内。也就是说，宜州或庆远府这上一级的统治机构，一直设置在宜山境内。因此，宜山县境便成为历代

封建王朝设州置府的中心地区，而宜山县城也成了历代王朝在桂西的政治、军事重镇。

从上述历史事实看来，自唐代起，宜山就已成为广西西北部的一个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以后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步加强，迁入这个地区的汉族也越来越多。由于民族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彼此在经济、文化方面得以取长补短。特别是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的传入，对于宜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现在的洛东乡，即清代的雒东里和唐代的洛封县或洛曹县境。宋《太平寰宇记》载：“洛曹废县，旧洛封县，在洛曹山。”清《庆远府志》载：“唐宋洛曹县，今县（按：指宜山）东四十里，雒东里大曹堡等地。”《宜山县志》载：“洛曹山在洛东里大漕渡口。山势如列屏，下瞰龙江，土人营其上为寨。宋时洛曹县在其下。后改为大曹镇，今废，遗址犹存。”现在乡境内有大曹村，村背便是龙江，江北石山绵亘，岗峦起伏，形势险要；地当黔桂路侧，为黔桂交通古道之要冲。这个村落附近的山上便是洛曹县治所在地。宋代把洛曹县并入龙水县（后改宜山县）之后，大曹一地仍然是个军事据点和经济要区。如明代的大曹驿、清代的大曹堡都设在这里，直到清朝晚期，在大曹村附近的龙江岸边曾经开设过盐埠，遗址至今尚存。

洛东之所以能够远在 1000 多年以前就成为桂西北政治中心或军事据点，和它正当交通要冲是分不开的。就省际来说，这里是广西柳州通向贵州独山都匀的交通古道。古道先是从柳州西北至柳城，再从柳城沿着龙江西进，经头塘、二塘、三塘、四塘、五塘、六塘而达大曹，途程约 200 里；再由大曹西进 40 里而至庆远府城，即宜山县城；再西经河池、南丹两县境而通贵州。这条古道在明朝末年还是黔桂交通主要路线，后来不知在清朝的什么年代，才改由柳州西部柳江县属的成团、洛满、流山等地，入宜山县境之洛黄、三岔而达大曹；会合原古道之后，再经宜山、河池、南丹而通贵州的独山。由此可知，洛东是上述两条古道必经之地。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保持通往广西西北部的政治军事中心庆远府的交通畅通和保持黔桂两省的交通，对于这个交通线上的这一要点十分重视。因为，如果不如此，不但在当地的统治地位无法巩固，而且广西的腹心重镇柳州也会受到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的极大压力。如在唐宋两代封建统治势力伸入到庆远府辖境之后，被统治阶级称之为“抚水蛮”的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不绝如缕。明代以后，聚居宜山西部和西南、西北等处的壮瑶两族人民的所谓“三巢”，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掠夺与剥削而经常给封建统治者以打击。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些反抗斗争，实行残酷的镇压。如果他们不能控制统治区内的交通线，就无法巩固这个统治区的政权。因此，封建统治者重视经营洛东是极其自然的。

洛东成为重要地区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它与柳城和被统治者视为“难治之区”的永顺副长官司及理苗县丞的辖境接界。洛东的东北，隔龙江即为柳城县境的六塘，六塘又与冲墨和永顺副长官司等处相接；洛东的东南，紧接理苗县丞辖境，而理苗县丞的辖境又是在清朝雍正七年（1729）划割忻城土县的功德、窑灰二里及永定土司的清潭、南乡二里而成。这些地方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重峦叠嶂的山区，封建统治者把它划作理苗分县，分而治之，其原因就是由于这些地区“最为难治”。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洛东设城堡，置戍兵，一则是为了扼守宜山县和庆远府境的东方门户，再则是为了防范附近山区少数民族的反抗。

正是由于洛东地区具有地当交通要冲，并与邻县接壤，以及接近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比较激烈的山区的特点，所以远在 1000 多年前就已成为政治和军事的要地。历代封建统治者为

了巩固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为了镇压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派兵戍守，并迁入大批汉人。这一方面加深了统治者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激起少数民族的反抗，另一方面，戍兵和迁入的汉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壮、汉等各族杂居，促进了民族交往，发展了民族关系，因此洛东一带壮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较一般的壮族地区为高。

（二）民族来源

洛东乡境内的居民共2163户，其中约300户是汉族，其余都是壮族。全乡共37个自然村，除大曹、塘冲（包括蒙村）、木见、大成四村居民绝大多数是汉族外，其余各村都是壮族。汉族都集中居住在唐、宋两代的洛曹县城和明清两代的大曹镇或大曹堡的附近，四村互相毗连。从中可以看出乡境内的汉壮两族的住区，也是各有其一定范围而不是错落相处的。

聚居在洛东乡境内的壮族以韦姓最多，分布于乡境东、南两面的泵村、涝村、同上、大冲、小冲、花流、坡榄、比七、板亮、冲翻、朋友、喇坡、大安、山脚等村，且多聚族而居。其次是覃姓，分布于乡境东北面的田心、覃田、维社、社村等村，也多是聚族而居。再次是罗姓和彭姓，前者多住在乡境西部的罗村，后者则住在南部的思九村。其余梁、廖、钟、樊、谢、何、莫、兰、黄、姚、周、张等姓，多数分布在乡境西北一带村庄，且多姓杂居。汉族计有周、罗、蒙、韦、程、王、张、李、姚等姓，除周姓多数居住在大曹村，韦姓（近30年来改为姓韩）居住在大成村（原名大村），罗姓和蒙姓多数住在塘冲村外，其余各姓也互相杂居。汉族绝大多数都住在乡境北部，而且村落还互相毗连。

洛东地区壮族的来源，可以肯定在明代以前就有部分定居在这里，但已无从稽考。现在居住在这里的壮族居民，据老人的口述及有关文字记载，都说是明末清初从别处迁来的。韦、覃是两个人口最多的大姓，原籍既相同，迁来的时间又不相上下。例如泵村、大冲、小冲、花流、同上、涝村、比七、板亮、冲翻九村的韦姓，自称是同宗共祖的子孙。据他们老人的口述及墓碑记载，他们是从宜山县街迁来的。最初迁至这里的始祖是韦德律，至今共历16代，如果以25年为一代计算，约为375年，从而推知他们迁来洛东的年代，大致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至于迁徙的原因，据大冲村72岁老人韦昭兰口述，当时洛东人口很少，他们的祖先是迁来开垦的，田心、覃田等村的覃姓，也是当时一道来此的。而且来此开垦之说，曾记载在他们的宗支簿上，可惜宗支簿在抗战期间散失，以致无从查对。又据覃田村62岁的老人覃庆芬（洛东乡卫生院医师）口述，他们祖先来到洛东，至今已有17代。其原籍地址，也与韦姓的传说相同。现住坡榄村的韦姓，如果按照他们宗祠内的祖先神位牌上记载的代数计算，从始迁到此的先祖韦副通算起，至今仅为13代，如按25年为一代，中间共历12代，约为300年前才迁到这里，时间约当清世祖顺治末年。但他们于清德宗光绪六年（1880）所刊的宗祠碑文，却有“如我辈始祖，自皇明乐业此庄”的记载。据此可知韦副通迁居坡榄的年代，至多也不过是明朝末年。此外，其他人口不多的壮族各姓，我们虽然没有逐一调查，但据现在泵村的莫姓和思九村的彭姓老人回忆，都说韦、覃两姓先到洛东，而他们的祖先是后到的。

又据喇坡和坡榄村老人们口述，他们韦姓始祖原姓韩，为汉代韩信的后裔。最早住在山东省历城府益都县糯米巷福堂街，与谭、谟二姓的祖先结为兄弟，后因韩信被杀，三姓一同

避难而迁来广西，并各去本姓的偏旁，韩改为韦，谭改为覃，谟改为莫。韦、覃两姓到广西后，其先人曾经住过思恩县，后由思恩再迁至宜山县属德胜附近的都街，最后才移居洛东的。至于迁徙的原因，详情不知，只听老辈传说，因为思恩县的山区地方狭小，所以迁到都街，后来又迁到洛东这片又宽又平的地方来。

至于定居这里的汉族，有的讲普通话（广西普通话，俗称官话），有的讲汉语方言百姓话（又名土拐话）。其祖先来源虽然比较复杂，但据了解，几个人口较多的大姓的祖先迁居洛东的年代，大致上是在明末清初。例如，现住大曹村的周姓，据老人们口述，其先祖是从湖南衡州迁来。而他们的第三世祖周志文的墓碑上，刻有死者的出生年月为清雍正十二年（1734）。据此往上追溯两代，加上50年左右，则为公元1684年。据此，可知周姓迁来洛东的祖先的出生年代，当在清康熙二十年（1681）左右。而其迁来大曹村的时间，约在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又如现住塘冲村的罗姓，据老人们口述，其先祖是从江西迁来的。原来姓汪，后改姓罗，改姓的原因他们已不复记忆。据推断，可能是入赘于当地壮族而改从妻姓的，因为现在宜山的壮族，罗姓仍有不少。至于迁居这里的年代，据他们第四世祖罗应启的墓碑记载，迄今已历15代。如以25年为一代计算，从迁来的第二代祖算起，约为350年。可知塘冲罗姓的祖先定居洛东的年代，大概是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又如现在塘冲村的蒙姓，据宗支簿记载，先祖原籍广东韶州府，后迁居广西田州，因世乱而迁至柳州住了一代，至蒙定全时才移居洛东。迁来洛东的年代，已无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据他们第五世祖蒙仁美的墓碑刊载，死者出生于清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如果从蒙仁美再往上追溯4代，约为100年。则他们迁来这里的祖先的出生年代约在1562年，即明嘉靖四十一年前后。假定他在30岁左右迁来洛东，其时当在明万历年间。又如现住大成村的韩姓，据清道光二十年（1840）宗祠碑上载，他们的先祖在明朝末年从山东迁来，第一世祖名叫士科，曾当过粤西思恩县千总，卸职后迁至庆远府东门街居住，再迁而定居洛东村。迁居洛东的具体年代不详，只知从一世祖算到现在，共为13代。据此，则大成村韩姓迁至洛东的年代，和坡榄等村韦姓相同。其实，大成村韩姓原为韦姓，约30年前，该村地主韩向荣才号召同他共祠堂的韦姓都改为韩姓的。韩向荣的父亲名叫韦连宗，是当地50岁以上的人通体咸知的事。至于韩向荣之所以要改韦为韩，也是以韦姓是韩信后裔的传说为根据的。大成村韦姓和洛东其他各村韦姓，祖先的传说相同，迁来的年代也相同，足见他们祖先与壮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所不同的，只是大成村韦姓早已不讲壮话，而讲汉族方言百姓话（又名土拐话）；其他村庄的韦姓至今仍讲壮话而已。

从上述的壮汉两族的祖先来源看，可知现住洛东乡境内的居民，不论壮族或汉族，都在明末清初从别处迁来，并非当地土著。而迁来这里定居的壮汉两族，由于长期友好相处，在血缘上早已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今住在大曹、大成、塘冲、木见、甘村的几个汉族大姓，为周、罗、韩、蒙、程等五姓。除周、程两姓外，韩姓本为韦姓，而蒙姓、罗姓则都是现在桂西北一带壮族的大姓。本乡蒙姓现在虽然操着汉语方言，自己承认是汉族，但其祖先的渊源，有极大的可能是由于婚姻关系而改从妻姓，或是由于汉壮两族杂居在同一个村庄里，最初时壮族的人数少于汉族，壮族不得不学习汉族的语言，日子久了，壮族便讲汉族的话了。假如从当地居民的姓氏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来看，这种关系是很显著的。例如，现住大成村的韩姓，原为韦姓，现在讲的是百姓话，木见村的韦姓也讲百姓话，而附近其他各村的韦姓却讲壮话；塘冲村的罗姓讲的是百姓话，而相距不过数里的罗村罗姓都讲壮话；木见村和大曹村的姚姓讲百姓话，而龙兴村的姚姓却讲壮话。这些具体事实表明，当地汉壮两族长期

以来，友好相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而在这种融洽相处的过程中，两者在经济、文化以及语言上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

至于洛东地区的壮汉两族于明末清初迁居这里的原因，除最初定居泵村的韦姓传说是来此开垦之外，如果再从一些历史记载来推断，还有如下几种可能性：

第一，可能是当时封建统治者为了实行“以土治土”的策略，从思恩和德胜一带征调土兵来到这素称军事要地和地当交通要冲的洛东一带立屯防守，其后一些土兵便在这里定居下来。据《宜山县志》卷三《时政》记载，清雍正六年（1728）庆远府知府徐嘉宾在武装镇压了莫大恩、覃海碧等的反抗斗争之后，在呈上广东巡抚的详文中曾说：“窃照庆远一郡属，在万山之中，民居其三，侬、佯、伶、侗、瑶、壮六种苗蛮居其七八，古之所称侗蛮，即其此也。苗族犷悍……最为难治。而宜山县属南北西三巢，龙门司与附近府城之清潭、南乡……皆强横不法，较他处为尤甚……”据此可知，境界与洛东相连的清潭、南乡两处，便是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最为难治”之地。他们除了把清潭、南乡两里，划归理苗分县管辖之外，再在与理苗分县紧相连接的洛东和三岔等处，设堡屯兵防守，借以保护黔桂的主要交通路线。历史上洛东乡的大曹地方，不是设堡便是设塘汛。而三岔地方，据《宜山县志》记载，由于“逼近龙江，上下皆滩，客轮往往被劫，后设外委（按：即千总、把总一类的武官）驻防，患始息”。现在洛东各村的壮族，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定的共有峒场，作为放牧、采樵及垦荒种畜之用。而各村公共峒场的来历，从上举庆远知府徐嘉宾的详文中，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他说：“查土兵土司，原系给有兵田；再于驻劄之所，拨给山地，自行垦种、帮补饭食。”这通呈省的详文，虽然说的是调拨南丹、那地、东兰三土州的土兵，驻扎德胜镇附近一带要隘的事。但以彼例此，现在洛东壮族各村的峒场来源，很可能是当时官府拨给土兵作为“帮补饭食”的山地。

第二，据《宜山县志·灾祥》记载，明朝万历二年（1574）和四十六年（1618），庆远境内曾经先后发生过两次大瘟疫，接着又是饥荒，当地人口亡死，十居七八。在以往毫无预防传染病措施的情况下，越是交通要道所在，传染也越厉害。洛东地当黔桂交通要冲，其死亡人数，当不下于其他地区。瘟疫之后，人口大大减少。洛东这一段平坦而肥沃的地方，势必有很多荒芜的田地。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就可能移民来此垦荒种植，以期对劳动人民进行粮赋的剥削。据喇坡、坡榄两村韦姓老人口述：“我们的祖先，从前原住在思恩，那里尽是山峒；后来迁居到德胜都街，那里也是山峒，地方窄狭，难得谋生，最后才迁到洛东这个又宽又平的地方来的。”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移民垦荒的情况。如果这里人口多的话，他们迁来，就不可能获得田地和山场，那与住在都街时又有什么分别呢？因此他们可能是在瘟疫流行之后，这里人口稀少，田地荒芜的情况下迁来的。

第三，现在洛东乡的大曹、大成、塘冲、木见四个汉族村庄，不但互相毗连，而且都集中在唐宋两代的洛曹县城和明清两代的大曹镇、大曹堡或大曹驿，以及清代盐埠附近。汉族之所以集中住在这个长期以来都是政治、军事、经济要地的地方，必然也和历代封建统治者在这里的政治、军事活动有关。据推断，他们或是被封建王朝强迫征戍而来的劳动人民，或是身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官吏或军队弃居留居此地。再不然，就可能是因经商到此而定居下来。如果再追溯到较远的年代，自从唐代在洛曹山下建立洛封县或洛曹县后，其县治所在地，也必然是外来汉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后来陆续迁入这个地区的居民，不论是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因杂居的关系，也必然习用先居住这里的汉族居民的语言。当然，这些后来者却不一定是由于政治或军事的原因而迁居这里的了。